

## 人类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石 人

中庸之道是孔老二最早提出来的。中庸的“中”就是反对“过”和“不及”的意思；中庸的“庸”就是“常规”的意思。从哲学上说，就是要求严格遵守旧质的界限和范围，不许突破，不许破坏旧质的稳定性，主张保守，反对革新和进步，反对革命和斗争。孔老二的这样一个货色，林彪却把它奉为至宝，胡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也就是说不允许破坏事物的界限和范围，要求旧事物永不变化，反对新事物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着矛盾。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矛盾斗争的发展突破了一定的界限，必然要破坏旧事物，必然要引起旧统一体的破裂，引起矛盾的转化，引起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

人类的进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有力证据。人类是在同大自然斗争和在社会矛盾中发展起来的，人类的实践史，就是一部斗争史。人类的出现是生物界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变革，它标志着地球历史中的一个新阶段。

马克思在其所著《资本论》中早已指出：“**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条件，是永远适于自然界法则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没有劳动，便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也就是不能有自己的生命。**”恩格斯也指出了劳动的重要意义，他说：“**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换句话说，没有劳动，古猿就不可能在各阶段中演变成成为今日的人类。

根据现代的科学资料来分析，人类的远祖住在森林里，生活在树丛下部的**主枝上**，比生活在树丛高层的较小的猿类更常到地面活动。大约在第三纪中新世或其前后，在非洲和中亚的广大区域发生了严重的干旱，森林大量地减少和大片地消灭，这时许多猿类灭绝了，有些猿类随着森林的变化而迁徙，继续向猿的进化道路发展。而原先生活在树丛基部的身材较大的一部分猿类，在有必要更多地下到地面生活时，也能较顺利地实现这样的改变。由于地面生活的需要，它们的上肢使用更频繁了，手和脚有了进一步分工，身体从半直立的姿势，变成完全直立姿势。当我们的祖先的手臂可以完全自由活动时，手的抓握能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继续发展，大拇指变长而有力，其余四指相对地较短了，使拇指和其他手指更加灵活合作，这是劳动的结果，所以决定手的发展的基本因素是劳动。恩格斯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是极其正确的。

由于直立行走，手的解放，头颅不向前倾，为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不断的劳动和语言的影响下，大大推动了脑的发展。脑本身发达了，为脑服务的感官及愈加明白的意识，抽象力和推理能力，随之日益发达，这些对劳动和语言又起着反作用，使它们更进一步发展，劳动器官与思想器官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形成最复杂、最完善的有机体——人类。

根据发现的人类化石材料来看，从猿人到现代人体质特征发展变化逐渐缓慢下来，不

象其他动物在同一时期还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许多种绝灭了,许多种新动物产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由于人类能劳动,能创造和使用劳动工具,代替了身体结构的功能,也就是人类能够创造和使用工具来积极地改造周围环境,与大自然斗争,这样使人与其他动物发生了根本的区别。

在我国北京猿人遗址里已发现的大约四十多个个体中,约有三分之一没有活到14岁就死去了,约有四分之一死于30—50岁之间,寿命最高的也不到60岁。远古人类并没有什么与世无争的黄金时代,更没有什么恬静优美的伊甸乐园。“**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受到十分沉重的压抑。**”(列宁)显然,否定斗争的中庸之道,即使在我们的远古祖先时代,也是完全行不通的,宣扬中庸之道,无异“数典忘祖”,不但荒谬绝伦,简直连赤身裸体、茹毛饮血的原始人都不如!

人类在自然面前并没有束手待毙。“**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我们的祖先不知中庸之道为何物,他们对自然进行了殊死顽强的斗争。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无数次的失败,给不断的成功开辟了道路,“**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恩格斯)人类终于一步一步地征服和支配了自然界。

动物只是依靠自己的肢体去单纯地适应自然界,人类则依靠劳动手段(主要是工具)去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工具延长和增强了人类的器官,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为了有效地向自然作斗争,谋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就需要不断地改善工具,而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恩格斯)在生产力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人,随着实践和斗争的发展,不断地实现着工具的改进和革新,推动着劳动技能和人类本身的发展,使人类支配自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

劳动手段的发展也是通过新旧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实现的。在无阶级的社会中,这又是同正确与错误、先进与保守的斗争分不开的;在阶级社会中,则往往还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劳动手段中暂时显得弱小但代表进步方向的新因素、新事物,在曲折的矛盾斗争过程中,由小变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弱转强,逐步战胜落后腐朽的旧因素、旧事物,终于取而代之。“**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火,作为一种自然力,被人类控制和利用,成为人类强有力的劳动手段和解放手段,便是矛盾斗争的一个生动的例证。

人类最初见到火,一定也象动物那样惊恐万状,四处奔逃。火山爆发,溶岩四溢,雷电轰击,枯木干枝因风刮擦,以至陨石坠地,都可能燃着野草树木,引起大火;森林中树叶堆积过厚,可能产生自燃……人们最初遇到这些自然现象,在惊恐之余,可能会感到好奇而不可捉摸。人类备受火灾之苦,但同时也慢慢地尝到了火的甜头。靠近火,异常地暖热,尝到被火烧死的动物,美味可口得出奇。因饥饿威胁而造成的扩大食物范围和数量的迫切需要,严寒的侵袭,冰川所带来的气候环境的压迫和影响,都有力地促进了人们对于火的探索欲,增强了利用火的进取心。经过不知多少次的观察、尝试和实践,人类终于学会了控制和利用天然火。火带来了温暖、光明;祛除了住地的阴湿和潮气;吓退了凶猛的野兽;利用火熟食,使很多过去没法吃的东西变成了可以吃的东西,扩大了食物的种类和来源,使人类不再受气候的限制而散布到地球各处去;熟食还缩短了人的消化过程,使人

类体质得到较快的发展。北京猿人便是世界上较早用火的人。

以石击石，偶尔会爆发火星，特别是黄铁矿石与火石相碰击时，甚至可能引起燃烧；在长期制造木石角牙工具，特别是在磨、锯、钻的加工过程中，又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观察、尝试和实践，人类终于又学会了人工取火。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也有“木与木相摩则然（燃）”和“钻燧取火”的记载。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到了近代，又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但“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对于火，由怕到不怕，由不知到知，由只知利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由机械运动到热，都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转化过程，都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结果。在这样的矛盾斗争中，必然会有许多痛苦和牺牲，也一定不乏敢于出入火海、勇于尝试的人。只有通过这样的斗争，人类才能从“未有火化”的阶段，上升到“修火之利”的阶段。颇有意思的是，人们在掌握取火方法之后很久很久，还往往不愿轻易放弃固有的火种，仍然习惯于保留它，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旧事物（用火）不会一下子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事物（取火）还未达到比较完善和方便易行的地步。然而人类毕竟又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了一大步，并为以后无穷的飞跃开辟了道路，为制陶、冶金术、火药、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发明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当人类还不知道用火时，人们还没有发音分明的语言，也没有人工制造的工具……”。（马克思）正在形成中的人所使用的还是木棒、石块等等的天然工具。但是，“一般地说，只要劳动过程稍微有了发展，他就会需要有已经经过加工的劳动手段。”（马克思）最初的人工制作的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叫旧石器。后来发展为磨制的，叫新石器。再往后则制造和使用了金属工具。自从开始人工制造工具以后，打制石器经历的时间占了99%以上，发展也十分缓慢。“人类在蒙昧期慢慢地几乎是觉察不出来地向前进步着。”（马克思）打制石器由不规整到逐渐规整，由器型贫乏、分化不显著到器型多样、分化显著，由简单的石质工具到与木、骨、角等配制而成的复合工具，由方法较少、技术原始到方法较多、技术进步，以及原料利用率由低到高，等等，都表明了旧与新两方面势力的消长趋向。后来在一个长时期中成为决定性武器的弓箭，就是在上述发展背景下逐渐准备起来的，特别是由于使用了标枪、鱼杈等复合工具，使人类的器官又延长了好多倍，后来又能用间接打法打制细长石片，用压制法修制细石器，制成更多更为精巧有效的镶嵌复合工具，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发明了异常优越的弓箭，能够“百步穿杨”，又快又准地命中对象，从而使猎物成了比较有保证的日常食物，打猎也就成了正常的劳动之一。

磨制技术在旧石器时代初期实已萌芽，如北京周口店第四地点即发现过一件磨制的骨片，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苗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曾发现过表面似经磨光的鹿角、鹿下颌骨、钻孔小砾石，还有磨制的骨坠。当磨制技术萌芽的时候，人们当然不会知道它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但是这种新因素、新事物代表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具有新的生命力，后来终于引起石器制作技术上的飞跃和生产上的革命，揭开了新石器时代的序幕，使人类从采取现成的天然产品为主的时代，进入以人类的活动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的时代。

金属器的发明也有类似的情况。原始人在长期利用火的过程中,会不断发现新的现象。含铜矿石(如孔雀石)的碎屑,偶然落到火堆热灰上,可以看到发亮的金属小珠在其中滚动;从烧熔的石块中淌出来的流质冷凝成块后,差不多有石头、骨头那么硬,而它的边稜和尖端,还往往比石刀、骨锥更锋利尖锐;它还有可以延展的特性;后来,更发现了它比石、骨远为优越的可熔性和可塑性。冶金术终于诞生了。但起先,人们当然不知道,正是这一发明,引起了生产上的重大变革,导致了金属器时代的到来和奴隶制的产生。

铜是最先冶炼的,但毕竟比较柔软,因此不可能把石头排挤掉,以后发明了铜锡合金的青铜,其坚硬胜过石头,但也还不能完全取代石头。只有铁才能做到这一点,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做到的,因为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要柔软。这同样反映了新旧事物反复曲折的矛盾斗争。金属器的应用,揭开了工具史上崭新的一页,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新旧矛盾的曲折斗争和转化飞跃,产生了一系列的发明创造,从简单的青铜刀铲、铁锄、铁镢,到相当复杂的大机器,进而至于更现代化的高、精、尖的工具设备,使人类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不断地加速前进,不断地跨越征服自然的新的更高水平。

**“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我们的猿类祖先已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正在形成中的人则已处于最原始的社会状态之中,为了最初的劳动和协作的需要,为了求得生存,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恩格斯)在动物中,雄性的嫉妒会使动物家庭跟动物的群对立起来;而在人类原始社会最初阶段的群或原始群中,则还没有任何家庭(或家族),而是实行杂交,**“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恩格斯)这在我国的传说中也有所反映,即“古者未有夫妇妃(同配)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管子·君臣》)

原始群是比较流动、松散和不巩固的,还停留在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杂交到后来虽然实行了上下辈的限制,但对于产生体质上和智力上比较强健的后代,仍有很大的不良影响。进步十分缓慢的生产力要求得到相对较快的发展,原来的群终于慢慢地过渡到了实行族外婚的氏族。这时,一切兄弟姊妹间的通婚都已禁绝,族与族之间实行群婚,血统以母系计算,**“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商君书·开塞》),这样就把彼此间禁止通婚的有血统关系的亲族范围,固定了下来,组成坚固确定的母系氏族,并由成偶数的氏族组合成部落,母系氏族公社从此形成。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当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只能是氏族公有制,氏族成员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共同劳动,共同享用。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最初的群婚,后来发展到对偶婚,血统和继承权一直按母系来确定,妇女在氏族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的。在仍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时期,打猎获取食物是极其靠不住的,采集却比较有保证,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担任的。后来发明植物种植,也主要是妇女长期从事采集的实践结果。妇女在农业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家庭里,妇女也一直属于主导和统治的地位,抚育子女,制备食物、衣服、管理和分配,无不取决于妇女。以后,农业有了较高的发展,畜牧业也发达起来,

就逐渐形成了新的分工,男子在农牧业劳动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妇女仍从事家务劳动,但是同男子谋生的劳动比较起来,已失掉了重要意义,妇女因此降到辅助地位,母系氏族社会便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原来不巩固的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婚姻,血统和继承权按父系来确定。

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相继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劳动部门,金属工具在生产中起了革命的作用。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剩余产品,为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和进行交换提供了可能,私有制和剥削出现了。公社内开始有可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土地逐渐成为家庭私有,全公社共同劳动的必要性也逐渐消失。利用他人的劳动力不仅已有可能,而且有利可图,由战争和交换中得来的新的劳动力便转成了奴隶,社会从此分裂为奴隶主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两大阶级,奴隶制产生了。随着交换和掠夺战争的发展,财富和奴隶更快地积聚到家长和氏族长的手里,贫富分化更加显著,产生了氏族显贵,近亲部落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部落联盟,其军事首长的权力在频繁的掠夺战争中变得越来越大,原始民主制度日趋崩溃。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家族与氏族的矛盾,部落内各氏族间的矛盾,以及部落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尖锐起来。“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恩格斯)原始公有制已经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并以血统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公社,就在上述新旧因素取代交替,以及阶级矛盾和冲突中,逐渐破裂瓦解,最后,旧的原始社会终于被新的奴隶制社会所完全代替。“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缓和冲突决不是中庸之道的所谓“调和”,而恰恰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一种表现,只不过使统治阶级的压迫得以合法化和固定化罢了。奴隶主阶级决不会对奴隶阶级施什么仁政,讲什么平等关系,而只能是奴役和压迫;奴隶阶级对奴隶主阶级,也唯有诉诸反抗和斗争。如果两者的矛盾可以调和,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奴隶制比起原始公社制来,是进了一大步。战争中的俘虏已舍不得处死,而被当作可供奴役的劳动力保存了下来;使用大批奴隶从事大规模的简单协作,创建了举世瞩目的宏伟建筑和水利工程;金属工具有了更多的创造和应用;农业、城市手工业之间以及手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剥削奴隶剩余产品的基础上,使一部分人能有闲余时间专门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建立起了古代的文明。但是奴隶制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榨取极其有限的剩余产品而建立起来的最野蛮、最残酷的统治,奴隶只是些“会说话的工具”,可以被任意驱使、奴役、买卖,甚至处死,承受着体力劳动的全部重担,身体和智力都受到极严重的摧残,奴隶主拥有大批廉价劳动力,就无意改进生产,更不敢把比较复杂和高价的工具交给奴隶使用。因此社会生产力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生产关系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随着这一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也愈益尖锐化,暴力革命终于使这样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也归于崩溃,而被在旧社会内部孕育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历史继续不断地发展,阶级斗争推动着阶级社会不断地前进。“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

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恩格斯)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庸之道想搞复古和倒退,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孔老二“祖述尧舜”,孟轲也“言必称尧舜”,其实,尧舜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其事迹究竟如何,并无直接证据,集前期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就曾尖锐地指出过:没有证据而去宣扬它,这是“非愚即诬”。原始社会本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更值中国原始社会行将瓦解的时期,柳下跖痛斥孔老二时就说过:“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那时的情景,就象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实际上,孔孟的真正目的是要以古为法,走历史的回头路,“克己复礼”,复辟当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奴隶制。

孔老二宣扬“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对中庸的解释就是:“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显然,他的中庸之道的本义,就是要维护西周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周礼,要一切以此为准,既不能越过这个规范,也不许达不到这个标准,妄图全面复辟西周奴隶制。

林彪宣扬“中庸之道”,目的也是要维护阻碍历史发展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不斗则止。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历来反动派对于革命人民的斗争,无不视同洪水猛兽,总是交替运用反革命的软硬两手,竭力加以阻挡和反对。特别是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往往求助于中庸之道,摆出一副鲁迅所说的哈吧狗样儿公允、平正的脸来,以不偏不倚、似是而非的姿态,以调和折衷的手法,掩盖其复旧的反动实质。他们满口“中庸”,惊呼斗争“过火”、“偏激”,连声哀叹“小人反中庸”、“乱了套”。但当得势之时,或狗急跳墙之际,他们对于被压迫人民和一切进步势力,却无不穷凶极恶,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唯恐还有半点疏漏和放松。孔老二上台不久就杀害了革新派少正卯,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中,也杀气腾腾地要以暴力夺取政权,“破釜沉舟”,与无产阶级专政决一死战,充分说明了他们那套中庸之道的极端虚伪性。“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然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庸之道的反动说教,永远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斗争永不止息,事物不断转化,革命的飞跃、新旧社会的交替,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历代中庸之道的骗人哲学,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的破产。从道貌岸然的巧伪人孔老二,到善于伪装自己的超级政治骗子林彪,在革命人民势不可挡的斗争面前,无不原形毕露,一个个都逃脱不了罪有应得的下场!